

革命历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赠阅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员会编

目 录

关于“胡四合事件”的回忆	余造邦 (1)
迫使阳城县安阳敌炮楼交械	
投诚的经过	苏 克 (7)
一切为了前线	阎省三 (14)
长征途中一盆腐肉	徐秀英 (21)
我所知道的1942年5月邓小平同志	
在阳城县的一些情况	苏 克 (24)
抗日斗争中的一点回忆	王文泉 (32)
话抗战烽火，忆红岩生活	程龙庆 (35)

关于“胡四合事件”的回忆

余 造 邦

“胡四合事件”发生于1945年2月19日，正是抗日战争的第八个年头。胡四合是重庆电力公司用户股的线路工人，所以这件事还得从该公司说起。

重庆电力公司共有三个发电厂：一个在大溪沟，安装的发电机是一部5000瓩的；一个在鹅公岩，安装的发电机也是一部5000瓩的；还有一个厂在南岸弹子石，安装的是两部1000瓩的发电机（轮流使用，实际只有一部1000瓩的发电机发电）。每月的发电量共500多万度。但电表上的实抄度数，只有49%多一点，损耗的电量则在50%以上。原因是发出的电量，大多被窃电漏掉。伪国民党机关，军、警、宪、特，以及他们的大小爪牙，历来用电都是分文不付。仅枣子岚垭一带，国民党行政院的宿舍二百多户，从来用电就不给钱。这还不算，还有那些特殊人物搭干股的公司行号，在他们的保护下偷电更是家常便饭。既然用电不付钱，就肆意浪费，日夜开灯，烧水煮饭，烫衣服都是用电。这样就更加重了电机的负荷，以致照上200W的轻磅灯泡，也不明亮。当时老百姓有个顺口溜说：“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晚上开灯不见亮，吊起一根红头绳。”重庆电力公司曾经多次向伪市政府社会局和西南行政长官公署请求彻底取缔窃电和无偿用电的

不法行为，后经批准，由公司成立“窃电取缔检查组”专门检查偷漏电用户。但窃电取缔小组的负责成员都是由军、警、宪、特机关派来担任的，这批人对取缔窃电毫无裨益，对一些大量窃电的特殊用户，反而起了直接保护的作用，不但窃电现象有增无减，而且重庆电力公司还要多负担一笔这批人的薪资。

重庆电力公司窃电取缔小组的工作人员，平常是不出面的。检查线路是否有窃电、漏电情况，都是由业务科用户股的线路工人出面。在2月19日的前一天，检查线路的工人发现苍坪街中韩文化协会餐厅的用电线路没有通过电表，而是搭在外线用电的。当时，线路工人只是把火线给它剪了，并告诉他们，餐厅偷电是不法行为，是要罚款的。工人走后，他们又把火线接上了。第二天，就是19日的上午，工人们发现后，又给打招呼，叫他们不要再接了。然而餐厅负责交际的田凯（警察局的侦辑队员、袍哥、特务）和餐厅的一些人，仗恃人多，不但不听，反而蛮不讲理对工人乱吵乱骂。工人一还骂，便遭到他们一顿拳脚（当时只有几个检查线路的工人）。工人们跑回用户股来汇报这一情况，当即引起大家的公愤，并得到股长章畴叙——作家章靳以的弟弟的支持，马上聚集了二十多人去中韩文化协会餐厅。本来是找他们评理，坚决取缔违章用电。但这般人一贯就骄横惯了听不进去，又仗恃有后台（这个餐厅打着“大韩民国流亡政府”的招牌，借口为“光复军”提供活动场所，实际是一些国民党的中层官员为了捞钱而开设的），满不在乎，还气势汹汹地又出手打人。工人们在极端气愤、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得不给予还击。去的工人，一般都是年青力壮的，餐厅这些

傢伙平时欺压老百姓作威作福，真的打起来是禁受不起的。田凯也被围在中间，他心慌想闯出去，拿一根木棒向一位工人扑去。胡四合见了，急忙上前把他抱住。田凯更慌了，拔出挂在腰间的左轮手枪，顺手朝胡四合的腰部就是一枪。胡惨叫了一声，一松手蹲了下去，田凯便趁机跑了。旁边的工人，急忙把胡扶住，胡说：“我不行了。”扶他的工人发现地下流了一大滩血，就马上叫了一辆黄包车送去临江门宽仁医院，刚到医院就死了。电力公司职工闻讯后，无不悲愤。这一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市。除了公司三个厂、三个办事处（南岸、江北、沙坪坝）的职工集中到都邮街公司外，还有首先响应的重庆市邮电局、重庆市自来水公司、江北民生机器厂的工人，随着全市厂矿的工人、商店店员和各大中学的师生员工都来支援，真是人山人海，路都塞断了。重庆电力公司的工人们将胡四合的尸体抬到中韩文化协会餐厅楼上，就地设下灵堂。

在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20日），重庆电力公司各科、股、室的职工代表约集了重庆电力公司产业工会的理事长陈铁夫（国民党市党部委员，后来是伪国大代表）、副理事长杨秀秦（国民党党员、线路组长），在公司后面二楼食堂商量，公推陈铁夫出面主持，向全市各界呼吁，申张正义，要求缉拿凶手归案，杀人偿命，保障人权，并推选了会计科簿计股职工代表刘德惠起草了《告全市同胞书》。当晚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议由陈铁夫主持。他首先说明了事件的真相，希望新闻界主持正义。重庆市的几家大报社，如中央、大公、新华、新民、益世等报，都来了记者参加，一致表示支持。《新华日报》记者还专门发了言，愿作工人们后盾。

当时重庆电力公司对这件事，既不阻止也不表态支持。因为当时物价连续上涨，电价却被伪政府控制不准涨，而且窃电越禁越凶，关闭也不行，全靠贷款维持，而企业则早已资不抵债。交通银行是最大的债主，专门派了人来代理总经理职务，实际是坐地讨债。但要扭转这一亏损局面，也一筹莫展。代总经理浦心雅想借职工力量刹一刹窃电之风，因此当国民党要他出面调停时，他便趁势搭眼皮，说他也没有办法。在用电方面对国民党的压力最大，因为在城内国府路、上清寺、曾家岩和南岸黄山及山洞、林园等几处，都是接的专线，任何情况下都要保证，不得停电。这几处是蒋介石经常来往居住的地方，生怕停电出事。当时工人们向伪市政府，提出了几个要求。但当工人提出“杀人必须偿命，要求枪毙田凯，维护人权，以申张正义”时，伪市长贺耀祖、伪警察局长唐毅不同意，说是在互相殴打的情况下，为了自卫，不是蓄意杀人，罪责不至抵命。工人们说：“特务一贯横行，鱼肉百姓，视人民如草芥，早已怨声载道，不能包庇开脱。持枪杀人，众目共睹，不枪毙田凯民愤难平，供电不能保证。”听说蒋介石知道后，急忙打电话给贺耀祖说：“不管工人提什么条件都答应，只要不停电，不把事情闹大。”并限期三天叫唐毅把田凯拿获归案。

这场斗争，由于南方局的领导，《新华日报》的同志具体帮助，各界群众的支持，运动开展得很快。不仅全市各行各业，工商学界，而且全国各地甚至香港的工人也来电支持，汇款慰问死者家属。本市各界人士送的挽联很多，布满了苍坪街、民族路、民权路一带中心地区。挽联多是针对当时民主空气窒息而发出的。记得有这样几副：“特务横行何处去？

民主自由几时来！”“阳世断不清楚 阴间去问包公”“严惩特务横行，杀人须偿命 保证取缔窃电，欠债要还钱”

“特务横行，苍坪街摆战场，何其毒也！四合惨死，民权路吊忠魂，能不黯然！”“胡四合你哥子死得好惨 狗特务他龟儿总要背时”“你死了为何不闭眼睛 是不是要等凶手前来”。这些挽联有的没有什么对仗，更谈不上什么工稳不工稳，但却反映了当时广大群众对民主的热烈要求和对特务横行的无比愤慨。有的对联还打了新式标点符号，真是新颖得很。虽然事隔多年，脑子里还深深地刻印着。

要求民主，要求严惩特务的呼声，声势浩大。工人们向国民党提出的要求，大概记得有这样几条：

- (1) 严惩凶手，速将田凯在肇事地点就地正法；
- (2) 保证今后取缔窃电和公司职工外出工作生命安全；
- (3) 优厚抚恤死者家属子女；
- (4) 市长亲到灵堂吊祭；
- (5) 出葬灵柩游行通城，沿途路祭。

国民党怕把事情扩大，不利于他们的统治，对所提的条件通通接受。伪市长贺耀祖也亲到长安寺来吊祭，还送了一幅“魂兮归来”的横挽幅。

在这场斗争中，为了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抗战，在不影响大的原则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工人们向国民党也作了一些让步。如灵堂原来是设在苍坪街中韩文化协会餐厅楼上，由于送的对联几乎把全市的中心区域、繁华地带布满了，他们借口“影响市容，有碍观瞻，外国友人看了不雅”，实际上是怕美国人见了，他们脸上无光。经大家研究后，同意把灵堂

迁到长安寺。又如出葬游行，原准备是经过国府路到大溪沟过河去江北刘家台安葬的。他们一再要求，不要走国府路，因为从国府路经过，有损他们的面子。结果灵柩是由通远门出城到观音岩改道，经张家花园到大溪沟过江的。

经过斗争，国民党在全市 的舆论压力下被迫枪毙了田凯。这场斗争，打击了特务横行的气焰，激发了群众的觉悟，增长了要民主、争自由的气氛，为后来的反对美军强奸沈崇事件、反内战、反饥饿、争温饱等民主运动奠定了基础，打开了局面，动摇了国民党在重庆地区的统治，最后配合了解放大军进军西南，迎接了解放。

（本文作者余造邦同志系沙区委统战部部长、区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迫使阳城县安阳敌炮楼 交械投誠的經過

苏 克

山西省阳城县位于晋豫边交界处，北靠沁水，东连晋城，西邻垣曲，南接河南济源，处于太行、王屋两大山脉之间，原系中共晋豫区党委中心地区。1945年5月至建国初期，是太岳区党委、太岳行署、太岳军区所在地。阳城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日寇为了固守阳城，曾费了很大的苦心经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力不从心，不得不撤退了一些孤立难守的据点。1942年元月，王新亭同志率领我三八六旅十七团（团长陈康，副团长尤太忠）、十八团（团长闵学圣）组成太岳支队，进驻阳城，开辟抗日根据地。日寇为了加强县城的防守能力，即主动撤离了董封镇、横河镇、索泉岭等据点。但为了掠夺阳城煤、铁、硫磺等战略资源，1943年先后增设了白桑、安阳、坪头及阳（城）晋（城）公路沿线若干据点。这些据点的敌人，经常对我进行突然袭击，捕捉我干部，掠夺我资财，活动频繁，威胁很大。1943年秋，我军曾集中三个主力团和两个独立营，拟拔除阳城县这个据点。先头部队已经进入进攻阵地，但因天降暴雨，后续部队未能如期到达，

只好放弃这个计划。我和县公安局局长周靖夷、一区区长杨鹤翔（现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副院长），负责俘虏的收容管理、审讯工作。我们已到达距县城两华里的坪头村，返回途中遇到了县委书记李敏唐同志和太岳四分区首长。

此次攻城计划，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却大大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敌我力量的对比，明显地朝着有利于我们方向发展，一直持续到阳城的解放。

安阳敌炮楼，一方面为保护阳（城）晋（城）公路的交通安全，更主要的是掠夺安阳的铁矿和硫磺矿。炮楼有坚固的防御设施，没有大口径的平射炮，是很难在短期内攻克的。敌人在此驻有一个伪军中队（实际只有五个班）和一个十二人的便衣侦察队。便衣队长张大才，四川人，原系我军分区侦察排长、驻阳城附近的情报站长、我红四方面军战士，44年春在敌占区进行侦察活动时因汉奸告密被俘。

伪军的成员，一部分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多数是本地人，家境较贫困，当伪军混饭吃；还有我接敌区被俘的村干部和民兵。死心踏地当汉奸的人极少。最复杂的是张大才的便衣队行动诡秘，对我威胁很大。

1945年三月，我二区公所驻东冶镇。阳城解放前几天，我们正布置春季政治攻势，以保卫群众春耕生产。县长刘裕民同志（后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建筑工程部长，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参加了我们的会议。

四月三日，我们得到情报，阳城敌人向白桑据点增加了约二百人，其中有部分日本鬼子。我们除派出区干队和民兵警戒敌人动向外，还通知各村进入战备。

四日凌晨，获悉白桑敌人有撤退迹象，我与区长宋秋成、区公安助理员宋双来，率区基干队一个班和东冶民兵（队长是战斗英雄）向安上方向前进。当我们到达曼上村时，敌人已开始从白桑撤退，我们立即派人协助白桑的干部和群众，迅速拆除敌人的炮楼，搬运敌人遗弃的物资。我们到达洪上村时，该村的党支部书记报告说：县城的敌人十分混乱，昨晚从晋城增加了一部分敌人，有极大可能是掩护阳城敌人撤退的。这个党支部书记有个侄子在伪军中任中队长，和我们订有《抗日协定》，是他特地托他母亲送来的情报。

安阳的伪军正在大抓苦力，一方面准备在撤退时搬运物资；一方面借此向群众榨取财物。当时已抓了近三百人，附近漫山遍野尽是躲避抓苦力的青壮年。

我游击队和民兵逼近安阳时，敌人便龟缩在炮楼内。下午四时许，我们开始向敌炮楼喊话，主要内容是：日寇已是穷途末路，败局已定。伪军兄弟们要认清形势，是当机立断，改恶从善，起义投诚呢，还是执迷不悟，跟着敌人到太平洋继续当炮灰，葬身鱼腹？如果你们尚无起义投诚决心，也希望你们身在曹营心在汉。俗话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冤家，多一堵墙。我们的政策是：有功记功，有过记过，胜利以后算总帐。当我正在喊话时，炮楼上有人问我：“你是不是姓苏？”我听到声音很熟，疑心是张大才，我反问：“你是不是张大才？”对方答：“是。”我说：“我是苏克，希望你下炮楼来，我们作一次单独的谈话，我用党性保证你的安全。”张说：“我不敢下来。”我答：“你不敢下来，那么，我上炮楼行吗？”张答：“我个人不能作主，需要和大家商量一下。”十分钟后，张回答说：“第一、只

允许你一个人上来；第二、不准带任何武器。”我和同志们商量。区长宋秋成说，炮楼里的人相当复杂，要慎重考虑。公安助理员宋双来主张我去，他说：“革命是会有牺牲的，担点风险是值得的。”宋双来的话，给了我很大勇气。我把笔记本和任何片纸只字都交给他，并告诉他，我万一牺牲了，请转告县委。我还作了我牺牲后的必要部署。

当我进入炮楼时，一伪军班长凶狠地说：“这下你可上当了，想飞也飞不走了。”我镇静而严肃地说道：“我今年二十四岁了，怕死就不会来。”对方立即嘻皮笑脸地说：“请别介意，我是和你开玩笑的。”这个班长的无理取闹行为立即受到其他伪军的斥责。

我当时带了一支短枪、一枚触发手榴弹，以防万一。如果敌人下毒手，我即和他们同归于尽。为了便于携带武器，我穿了一件短大衣。炮楼有个火炉，温度较高，我还穿着皮大衣，微微有点出汗。张大才坚持要我脱掉大衣，并动手来帮忙，这样就暴露了我带的武器。我立即采取主动，说道：“请原谅我带来了武器，如果你们居于我的处境也是会理解的。”我持枪在手注意着反应。张大才说：“请把枪放好，有我张大才，你不必顾虑安全。”

当时，在我的周围已站了三十余人，有送香烟的，有倒开水的。我趁机向他们宣传了日寇必败的形势和我党对投诚人员的政策，希望他们痛下决心，弃暗投明。之后，我又把几个班长单独找在一起谈，从而解除了他们一些疑虑，促其早下决心。

我又把几个接敌区几个村被俘的民兵和几个党员干部找在一起，要他们在起义投诚中发挥作用，并对他们讲，至于

你们被俘的经过和当了伪军的表现，党很了解，人民自有公论。他们向我提供了许多情况，让我做好了张大才和中队长的工作，并且发誓，不管投诚是否成功，都将保证我安全离开炮楼，必要时不惜献出生命。

我和张大才单独谈了一次话。我说，这次投诚是否成功，关键是你的决心。他略加考虑后提出三条：第一，投降后，要妥善处理好这些人员。当了伪军，完全没有污点的人很少，一定要按政策办事。第二，由区委给他写个材料，证明他被俘经过和当了伪军的表现。第三，派人把他送回军分区敌工科。我立即作了如下的答复：第一，一定按党的政策办事，决不感情用事；第二，一定如实地反映情况，包括你在这次投诚中所起的作用；第三，派人送你回军分区敌工科。

中队长躲在炮楼的最高层，不愿见我。我叫一个伪军排长去请，他不来。我说：“他不来，我去。张大才，你陪我走一趟！”张大才说：“用不着，我去把他请来就是了。”

几分钟后，中队长来了，他恭敬地行了个军礼，接着说：“我不是架子大，不来，而是觉得自己当了汉奸，无颜见八路军长官。”我也坦率地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起义投诚，为时未晚。”并进一步宣传了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促其早下投诚决心，还告诉他，你们已陷入我军包围，处于“四面楚歌”之中，是战败被俘，还是起义投诚，将功折罪，何去何从，望你慎重考虑。不过，允许从容考虑的时间不多了。他最后说，请我们去他家找他的哥哥来一次，如果找不到他的哥哥，他家中任何一个亲人来都行。我认为该做的工作都做了，关键是寻找他的哥哥。我正准备起身走时，

一个人突然抓住我的衣领，问我认不认得他？我一看，此人是一个伪村长的儿子。我说：“你还认得我吗？”他说：“你抓过我三次，是老交道了。”我提枪在手，厉声说：“没有杀掉你，是因你还年轻，可以教育。你今天敢耍无赖，我的枪法，你是知道的。”他立即改变态度，并说：“我不是没有良心的人，今后请你关照的地方还多呢！”我意识到情况远比我想象的复杂，为了安全，我请张大才和一个伪军排长把我送出炮楼，张满口答应。当通过吊桥，进入我军阵地时，我对张大才说：“万一中队长变卦，你怎么办？”张说：“我和他是把兄弟，此事就请你不必多虑了。只要把他的哥哥找来，我保证把部队拉过来。”

我向区长宋秋成等同志说了在炮楼的经过之后，他说：“从你进入炮楼，我们为你的安全提心吊胆了两个多钟头，现在总算一块石头落地了。”

天亮前，我们找到了中队长的哥哥，做了耐心的思想工作，请他大力促成他的弟弟投诚。经过几番协商，达成了如下协议：

第一，伪军官兵，携带自己的生活用品，由我方带领，进入我指定的驻地。

第二，所有武器和军用物资，不准私藏或转移，由中队长负责，交我方接收。

第三，投诚人员，集训三天，根据本人自愿和有关政策规定，分别听候处理。

上午十时许交接工作完毕，民兵开始拆毁工事，放火烧了炮楼，安阳一带宣告解放。阳晋公路上的敌人，开炮对我射击，但是已无可奈何了。

此次我们收缴了各式步枪三十八支、短枪三支、日造手榴弹十五箱，还有一些其它军用物资。

安阳的解放，使阳城的敌人，更加孤立，防守更加困难，军心更加动摇。安阳解放的第三天，我方攻克了阳城县城。

我为党作了一点应作的工作，党和人民却给了我极大的荣誉：《太岳日报》作过两次专题报道；县委通报表彰刘裕民同志为阳城县烈士陵园写的碑记中，对此有一段专门的记述。

（本文作者是重庆市沙坪坝区政协副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山西阳城县二、四区区委书记）

一切为了前线

阎省三

我的家乡是河南省泌阳县羊差区。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农民。一九三九年，我刚十九岁。一天，我进桐柏山砍柴，突然遇到了已改名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的红军游击队。他们待人亲切，还给饭吃。这样好的军队天下难找，我便投奔了他们。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当红军总比在家挨饿强，总比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好，至于其他的革命道理，则是参军后受了党的教育才逐步懂得的。

第二年，我们游击队的人数增加了好几倍，编为新四军第八团，我在团侦察队当侦察员。在一次与日寇的遭遇战中，我左大腿被敌弹穿透住了医院。此时我很担心，也很苦恼：刚参加革命就负了伤，如果残废了怎能再上前线打鬼子呢？幸好伤很快痊愈了，没有留下残疾。可是出院后领导要我去被服厂工作，没让我重返前线。从此我就战斗在后勤岗位上。

一、被服厂

我来到新四军二师供给部当管理员。虽然那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可是国民党仍然采取“消极抗日，积极

反共”的反革命方针。他们在经济上卡我们的脖子，使新四军的补给面临严重的困难。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保证前方抗日将士的需要，我们自力更生，先后兴办了被服厂和修械厂。被服厂开办时有四十台缝纫机，四十多名工人，不久发展到一百多台缝纫机，一百多名工人。我对这项工作一面感到陌生，同时也感到任务艰巨。因为全师万余人的服装靠我们供给，担子可不轻啊！

制作被服的布料是从上海、南京两地运来的。那里的地下党同志在日寇严密封锁下，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各种渠道，成批地为新四军买来缝纫机、白布和染料，又冲破层层封锁线，将这些东西用牲口、木船转运到抗日根据地，由被服厂裁剪、缝纫、洗染制成被服。

我们厂共有三个管理员，职务相当于连级。一个管染布，一个管缝纫，一个管理收发材料。我就是负责材料收发的。另外设有伙食团和一个警卫班。工人都是来自各地的穷裁缝，有缝纫机的随身带来，没有的由我们发给。他们都是青壮年，少数带有家属。因为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待遇比较合理，工人们十分乐意，和管理员关系很好，对我们部队很有感情。为了安全谨慎，我们一般不换人，工人们也不愿意离开。

厂里实行的是折算实物计件工资。一个缝纫工完成一包服装（每包十套），给的报酬相当于一块多银元。我们没有固定厂址，因为敌情瞬息万变，随时都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的偷袭和特务的破坏。工厂随着部队长年辗转于天长、六合、扬州一带的农村，有时藏在偏僻的山沟中，有时驻扎在平原的村庄里，也有把洗染、缝纫分散在几个地方的情况。最